

1917

梅州文史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梅州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梅 州 文 史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梅州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一九九四年六月

封面题字：叶选平

封面设计：古玉如

责任编辑：孙秋珍

古清华

梅州文史(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梅州市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政协地址：梅州市江南梅龙路民主大楼 邮编：514021)

*

梅州市科协科技咨询服务中心承印

*

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准印证

94 粤印准字第 114 号

《梅州文史》编委会

主 编：刘雨彪

副主编：钟兰敏 李柏林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EA74/18

古清华 叶云章 叶绍桂 丘 峰

孙秋珍 张其宇 陈向华 陈美豪

杨维清 幸公达 谢心贤

目 录

· 人物春秋 ·

- 邓文钊传略……………李清泳(1)
- 刘子超烈士生平事迹……………赵良(26)
- 吴康教授及其学术思想……………姚浊波(36)
- 温鸣剑小传……………温泉(44)
- 缅怀医学专家陈寿康……………林钧南(47)
- 爱国民主人士陈海珊……………张金堂(51)
- 积极参与维新活动的丁惠康……………江村 蔡雪昭(59)
- 中国近代酿酒工业的先驱者——张子章……………张广哲(65)

· 教育史话 ·

- 南华大学始末记……………邓贞明 张其宇(68)
- 兴宁四中工学团追忆……………温解凝 李柏泉(74)
- 梅州客家女子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刘淼水(82)
- 广东省政辅班中的梅州客家学员……………利兴民(87)

· 文化艺术 ·

- 抗日战争时期兴宁的《天下》报……………曾宪宏(90)
- 梅县报业发展史……………吴炳奎(100)
- 梅州名城赋……………南山松(106)
- 客家山歌的社会内涵和文化价值……………温萍(109)
- 客家山歌源流初探(连载)……………黄火兴(117)
- 绚丽的南国牡丹——广东汉剧……………田诒忠 田辛垦(142)
- 大埔的摩崖石刻……………谢如剑(146)

· 学术研讨 ·

- 在时代浪潮中对客家传统文化的扬弃…………… 严 峻(151)
面临当代潮流挑战的客家人应取的策略…………… 陈应良(160)
客家文化与犹太文化差异的深层透视…………… 谭元亨(164)
客家人如何迎接当代潮流…………… 陈美豪(172)
梅州客家人文化心理变异的思考…………… 刘南彪 邓士宏(180)
客家源流考察纪行…………… 美 彪(185)

· 史海拾穗 ·

- 陈庭凤与蕉岭县反洋教斗争…………… 赖雨桐(199)
三十年代的周辉甫…………… 谢崇德(203)
建国前我国民主党派在梅州的活动史略…………… 欧阳英(206)

· 侨史纵览 ·

- 梅县的水客和侨批业…………… 张自中(211)
蕉岭客家人移民台湾述略…………… 赖雨桐(218)
印尼蕉岭同乡会缘起与活动…………… 吴嵩喜(227)

· 民俗风情 ·

- 客家凉亭…………… 田辛垦(229)
丰顺畲族源流和风俗…………… 文衍源(233)

(附:畲族歌谣)

邓文钊传略

李清泳

1941年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虎视眈眈,妄图一口吃掉中共领导的新四军,还想借此时机摧毁中共及全国进步民主抗日力量。就在中国革命和抗日事业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刻,香港上层社会却出现了令人难于理解的奇事:一对豪富家庭出身,居于豪富地位的兄弟,竟不畏风险,挺身而出,大力帮助中国共产党创办港九社会前所未见的进步报纸。这对兄弟就是邓文田、邓文钊。

在漫长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邓氏兄弟矢志不渝地支持革命,竭力帮助中共驻港组织的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由于邓文钊与中共的关系比较密切,担负的工作较多,故让二兄文田一手经营邓氏的家业,自己则全力投身革命工作。全国解放后,在香港的工作告一段落,他又毅然回广东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为港澳上层工商界中最先回内地为新中国服务的栋梁人才。

一. 望族后裔,港九名人

邓文钊,又名礼全、永年,原籍广东省五华县大坝区七都围水寨村。1908年生于香港颇有名望的工商业家庭。曾祖父邓鹤溪,又名邓樵六,少年时家境清贫,离乡背井到香港谋生。初以打

石为业，勤劳俭朴，待人至诚，精于钻研业务，功作精细，颇得同行业和顾客的赞誉。继而在建筑行业中当上承包工程的“小判头”。香港人称他“打石六”。他善于运筹和经营，逐渐成为拥有雄厚资金的建筑巨商及地产商。邓樵六发迹后，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为五华旅港同胞中声誉甚高的知名人士。“邓元昌堂”名冠全家族，该堂名直到40年代仍驰名香港。

邓氏家族与香港其他望族有不少联姻关系。文钊的祖母曾灶娇系现今香港新界沙田古迹“曾家大屋”创始人的女儿。文钊的母亲周丽华，其娘家也是香港一大望族，外祖父周少岐是清诰授朝议大夫、香港定例局议员。舅父周俊年是香港华人首席代表，堂舅父周锡年是爵士学位名医，表妹夫关祖尧律师亦曾任华人首席代表。文钊可谓自小生活在香港上层社会之中。

邓文钊父亲邓镜湖和母亲周氏很早辞世，所生四个子女由祖母曾氏抚养长大。文钊的长兄英年早逝，文田、文钊备受祖母宠爱。兄弟俩同在私塾启蒙，1920年至1927年就读于香港教会学校拔萃书院。文钊成年后，与香港富商何家之女何捷书（何香凝的侄女）结婚。1927年曾家不幸被贼劫杀，家产即由邓氏两兄弟继承，文田留港料理家业，文钊于1928年偕妻往英国留学。

广东陈炯明叛乱后，廖仲恺被捕入狱，何香凝携子女梦醒、承志到香港避居娘家。那时邓文钊与他们已有接触。文钊偕妻赴英时，廖梦醒亦同船赴欧洲。1930年何香凝远走欧洲，到英国住于邓文钊夫妻的寓所。此后，邓、何两家关系愈加密切，文钊与梦醒、承志姐弟结成终生莫逆之交。

1931至1935年，邓文钊先后在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和剑桥大学 EMANUEL 学院经济系攻读，取得经济学士学位。1936年夏秋之间，文钊夫妇携儿子广殷乘德国邮轮“波茨坦”号返回香港。

返抵香港后，文钊与其兄文田用自己的家产作保证金，取得

了英国在香港开设大英银行的买办权。大英银行结束远东的业务后，他又通过返港途中结识比利时银行经理的关系，取得了比利时所办华比银行的买办权，先后任该两家银行的华人经理。同时，邓氏兄弟还联袂经营“崇德堂”出入口庄，两项业务齐头并进。文钊从此在香港社会上崭露头角，与港英政府官员及港九同胞中的上层人士交往渐多，很快成为在香港社会的知名人士。他身居繁华都市，又因职业和身份关系，经常与“上流人物”周旋，但他极为注意洁身自爱，从未沾染不良嗜好。为此，朋辈们常称他为“正派人士”，加上平易近人，经常接触下层群众，关心公益事业，急公好义，故在社会上还享有“好人缘”的美誉。

二. 接受进步教育，走上抗日救国之路

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素以思想激进著称，剑桥大学有不少支持社会主义学说的流派，邓文钊在学时已参加了左翼读书会，开始接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启蒙。邓文钊留学英国期间，又常与何香凝一家人相处，受到他们的影响和教育，使邓文钊从接受启蒙到倾向革命，乃至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

邓文钊返回香港后，公余时间经常阅读美国进步作家斯诺访问中国陕北后发表的作品，以及其它进步书刊，进一步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中的立场和政策。1937年“七·七”事变，激起了邓文钊的抗日义愤。同年，廖承志受中共中央派遣，到香港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何香凝、廖梦醒、李少白也先后因公到香港。他们都曾住在邓文钊家中，交往更为密切，对邓的教育和影响也更多，使邓文钊逐渐产生了直接参加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工作的愿望。他们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由亲戚发展为同志、战友。

经过何香凝一家的介绍，邓文钊认识了宋庆龄，进而建立了

诚挚的友谊。1938年6月,香港成立了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大同盟”,邓文钊是该盟中央委员会七位中央委员之一(其他委员是宋庆龄、廖承志、廖梦醒、爱泼斯坦、法朗斯和克拉克)并兼任司库和负责宣传、募捐工作。邓文钊从此把主要精力倾注于革命和抗日事业,竭尽所能为“保盟”工作。初时,“保盟”没有办公地点,邓通过同窗好友、香港大新百货公司蔡氏家族的子弟,租下他们的业产西摩道21号作为“保盟”的办事处。邓本人则将坚尼地道的房产和浅水湾私人泳棚提供给“保盟”作为活动场所,用于宴请宾客及接待中共因公来港的领导干部。解放后,叶剑英在一次接见邓氏家族成员时,曾回忆起当年路过香港,邓文钊在浅水湾招待他的情况。

当时,香港当局虽不干涉抗日宣传,但国民党在香港的特务活动十分猖獗,谁支持中共随时都会受到迫害。邓文钊不避艰险,毅然接受中共的委托,以他兄弟经营的“崇德堂”出入口庄作为八路军办事处的通讯站和接受华侨抗日捐献的联络站。从1938年到1941年底香港被日寇占领之前,不断接受东南亚各地爱国华侨捐输款项和物资,转送八路军、新四军和东江游击队。

这段时期由宋庆龄介绍,邓文钊还认识了斯诺、路易·艾黎、卡尔逊等外国友人,邓文钊是斯诺著作的忠实读者,进而成为他的挚友。斯诺夫妇有关中国的著作均署名赠送邓文钊,至今邓家还保存着早已绝版的斯诺著作。40年代初斯诺和路易·艾黎得到宋庆龄的大力支持,发起在陕甘宁边区和国统区组织“中国工业合作社”,邓文钊亦积极参加。

三、戮力同心创办《华商报》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逼迫下,表面上不得不接受中共提出合作抗日的要求,但实际上毫

不放弃其对内反对共产党及一切民主进步力量,对外妥协的立场。1939年底至1941年初,先后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妄图消灭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新四军,并乘机摧残国内的进步势力。他们加强新闻和邮电检查,查封进步书店和报刊。而重庆的国民党当局和南京的汪伪集团,通过他们各自掌握的新闻传播系统,大肆制造“蒋汪合流”和反苏反共的舆论。因此,中共决定把重庆和桂林等地文化界、新闻界一大批进步人士撤往香港,让廖承志在香港建立对外宣传据点,创办报刊和书店。

当时,香港虽有华文报纸20多家,但大多数受国民党或港英当局控制,少数是中间派,没有一家左派报纸。在香港报界中虽然有些人和进步人士有联系,愿意帮助中共做些宣传工作,但报纸毕竟不是中共自己办的,宣传效果不大。因此,周恩来指示廖承志,一定要在香港创办一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报纸,不仅在香港发行,还要发行到国外去;报纸不以共产党出面办,也不要办得太红,但要坚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

在香港办报或出版期刊,还须商请有社会地位的人士作为“法人”,出面向港英政府申请注册,还要先付港币2000元作保证金。要在香港寻找这样一位愿意承担风险,又肯出钱、出力、出面帮助中共办报的“法人”,在当时,邓文钊是个最合适、最可靠的人选。

据此,廖承志找邓文钊说明了中共中央的意图,请他支持。邓文钊即爽快答应。并动员胞兄邓文田一同出而向港英当局申请注册,由文田担任报社的总经理兼督印人,文钊任副总经理,协助廖承志进行各项具体的筹备工作。从寻找报社地址到办理注册手续等等事务,都由邓文钊出而进行。由于策略上的需要,报纸定名为《华商报》。

办《华商报》资金不足，邓氏兄弟慷慨解囊，共同负担了一部分经费。还出资为报社租赁房屋，物色承印报纸的印刷厂，使《华商报》得以在1941年4月8日顺利出版。

1941年既是国内政治斗争激烈的一年，又是国际形势急剧变化的一年。《华商报》的创刊适应了斗争形势的需要，在斗争策略上，坚持爱国主义的立场，贯彻执行中共团结抗日、反对妥协投降、反对倒退的政治方针，为众多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所接受。同时，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对坚持抗日、支援国际反法西斯斗争起了积极作用。

《华商报》出版不久，便遭到反动势力的破坏。香港警察总监俞允时赴渝时，戴笠要求他取缔《华商报》，又令中央社抵制《华商报》，不发电讯稿，并破坏《华商报》与印刷厂的关系。加上香港卖报纸要通过“报房”转手，“报房”又受反动势力的操纵，不销售《华商报》。小报贩卖《华商报》也屡受威胁，甚至挨打。发行工作困难重重。邓氏兄弟在困难面前没有退却，设法安抚报版并雇请一批报童按户派送。邓氏兄弟为使《华商报》的出版工作免受较大的干扰，一方面协助宋、廖与俞允时联络感情，打通香港政府的关节，另方面慷慨出资4万元，加上陈嘉庚捐助4万元及其他方面的支援，华商报社自己买下一间印刷厂，并在市中心租了一幢四层楼房，购置了卷筒印刷机，既可自行印刷，又可扩展业务。1941年8月廖承志在香港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华商报》开办迄今，通由邓文钊做生意出资本，未花我们半文钱”（见《廖承志文集》上册第96页）。

四. 转入内地，继续为革命奔走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华商报》被迫停刊。邓文钊一家经中共驻港组织的安排，由东江纵队掩护，得潘静安、柯平等协助，从香港撤退到粤北韶关，同柳亚子、乔冠华等文化界

人士住在当地地下党接待站。廖承志在粤北被捕后，在韶关的何香凝也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邓文钊夫妇又利用与何香凝的亲戚关系，协助党组织与何联络，多方奔走，为营救廖承志出力。邓文钊还与东江纵队领导保持经常联系，后来他从韶关往惠州淡水，进入东江纵队活动地区。当时游击区战士和人民生活虽然都很艰苦，但到处呈现着高昂的抗日救国热情，与国民党统治区对抗战抱着消极观望、生活萎靡彷徨的情况迥然不同。他见到“红小鬼”用草扎成球当足球踢，回到韶关就买了足球设法送给他们，游击队没有望远镜，他又买了望远镜送去。

邓文钊在内地生活了三年多，与祖国大后方的人民群众患难与共，亲眼看到国民党政府的苛政，残害同胞的真实情况和中共艰苦奋斗，坚持抗日的事实。鲜明的对比，使他心中的信念更加坚定：只有依靠共产党，中国抗日才能胜利，国家的富强才有希望。

1945年日本投降。邓文钊一家返回香港。他和邓文田协力恢复生意，一同在华比银行担任华人经理。同时继续为革命事业出力。邓家的大宅再次成为中外友好进步人士聚会的地方。何香凝、方方、乔冠华、龚澎、饶彰风、连贯、廖梦醒等人常常在那里会见国际友人和其他方面的爱国人士。当时座上客有许多是驻港英方上层人士，如何明华主教会督，港大副校长 DUNCAN SLOSS 等。这些人士对中共驻港组织的工作都起了不同程度的掩护作用。

1945年底，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解放区，新一军在东江纵队驻防地区实行“三光政策”，大肆烧杀。邓文钊冒险从香港进入东江淡水地区，目睹国民党军队的暴行，义愤填膺，随即写信给当时在美国的爱泼斯坦，请他会同斯诺、卡尔逊等国际友人揭发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行，呼吁国际上正义人士支援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运动。

五. 再度受命恢复《华商报》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盼望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实现民主政治,使国家富强起来。但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表面上同共产党谈判,实际上加紧部署反共反人民的新内战。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为了动员人民起来斗争,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努力建立宣传机构。广东区委按照中央指示,设法占领广州、香港的宣传阵地,其中最重要的是争取香港《华商报》复刊。广东区委派领导干部尹林平、饶彰风执行这一任务,并郑重托邓文钊再度出面办报。邓文钊一如既往地全力协助,亲自出任报社的董事长兼督印人,经过3个月的紧张筹备,《华商报》于1946年1月4日正式复刊。复刊后的《华商报》有自办的印刷厂,并在广州设立了分社和营业处,在国内广泛发行。1946年5月23日周恩来给邓文钊等人写信,称赞他们的工作“成就甚大”,并对他们办报作了一些指示(见《周恩来书信选集》296页)。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日趋紧张,各地进步报刊先后遭到国民党的严重破坏。1947年3月,《新华日报》被封闭。《华商报》成为解放区外唯一直接传播中共中央新闻的报纸,成为号召华中、华南、华东地区人民以及港澳爱国同胞和海外侨胞群起呼吁民主建国、反对国民党制造内战和种种倒行逆施的舆论先锋;在内战不可避免,中共被迫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解放战争时,《华商报》又成为号召蒋管区人民及海外侨胞支援解放战争早日夺取全面胜利的战斗号角。

《华商报》复刊仅数月,广州国民党当局就派出特务和打手捣毁广州分社门市部,6月28日更悍然封闭了广州分社及营业处。香港的发行工作也接二连三地遭受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他们

对报童恫吓、跟踪、警告、殴打、截劫，烧毁大批新出的报纸，使派报的报童思想甚为波动。邓文钊积极与饶彰风等同志商研排难之策，还以董事长身份，亲自登上报社楼顶，对数十名报童进行慰劳、教育和鼓励，使报童们及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得到很大的精神鼓舞。

报社经济上紧绌时，屡屡向邓文钊借款应急，他从不推托。1947年秋和1948年秋报社因经济困难濒临停刊，两次发动“救报运动”，邓文钊不但自己继续出钱，还发动香港工商界进步人士捐款。在《华商报》复刊后，一直坚持到1949年10月中旬广州解放才自动停刊。在这将近四年的时间里，其所遇到的困难、阻挠、破坏比1941年初创刊时更为严重，邓文钊支持《华商报》所承担的风险也更大。邓文钊对党的革命事业有着正确的认识，对革命的胜利充满信心，对廖承志、饶彰风及其领导下的一批工作人员有高度的信任感和深厚的感情，使其形成了全力支持《华商报》的坚定信念。报社遇到重大困难，或港英当局出面刁难（多次指控华商报社所谓“违章建筑”，说《华商报》的新闻报道“损坏个人名誉”，常派人到报社盘查等等），都由邓文钊协同饶彰风出面应付，出力解决。

六. 一往直前，义无反顾

重庆国民党当局视《华商报》为眼中钉。他们意识到邓文田、邓文钊兄弟在《华商报》中的重要作用，便向比利时公使提出抗议，要求比利时政府责成华比银行总经理，压邓氏兄弟停办《华商报》。邓氏兄弟严词拒绝，邓文钊表示：“宁可退出华比银行，也不退出《华商报》。”华比银行仍要依靠邓氏兄弟做生意，故对他们无可奈何。

除了办报之外，邓文钊还竭力帮助中共驻港组织从事宣传

和统战工作，团结港澳工商界人士支援国内解放战争，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力量。他充分利用同港英当局高级职员有广泛关系的有利条件，通过他们的斡旋，帮助新华社在香港成立分社，使一批从国内外到香港工作的革命干部和文化界进步人士安居下来，掩护他们的工作和接济他们的生活；《华商报》发动港澳同胞捐赠药品支援华南游击队，邓亦积极帮助在工商界中发动募捐。

1946年底，一批分散在华文报社担任经济记者的新闻界进步人士，在中共驻港组织的鼓励下，合作创办揭露国民党经济劣迹、对经济界进行统战工作的《经济导报》，邓氏兄弟对此义举甚为赞赏，并且热情地予以资助。

1947年，中共驻港组织指导菲律宾来港经商的进步侨领黄长水建立“香港华侨工商俱乐部”，以团结港九工商界支援国内人民解放战争。邓文钊虽然忙于支撑华商报社的工作以及其他社会活动，亦给予热情支持，并常抽出时间参加俱乐部的活动。

1948年下半年，中共香港分局奉中央指示，开始设法护送旅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其他知名人士陆续转赴北方，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这项工作要保证万无一失，必须高度秘密和极为细致地策划安排，邓文钊也尽力协助。1949年春，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沈钧儒和郭沫若等一行，在邓文钊家中会合，避开香港特工人员的监视，然后到湾仔乘船北上秘密离港。新加坡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专程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途经香港时，亦由邓文钊牵头组织香港各界爱国人士近千人，在普庆戏院举行热烈的欢迎大会，在港九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广州解放前夕，中共驻港组织策划了华东华南多处国民党部队起义；同时对华南境内许多地方的土匪流寇进行了广泛的安抚收编。邓文钊受饶彰风之托，协助这一工作。他们曾多次在自己的家中进行谈判，取得良好的成效。

新中国成立前后，国民党一些驻港机构纷纷起义，或正在酝

酿起义。中共中央派了冀朝鼎到香港准备接管这些机构及继续推动起义。邓文钊应邀参加这项工作。

1949年10月中旬，《华商报》在香港终刊后，饶彰风率领工作人员撤回广州创办《南方日报》。那时广州还没有卷筒新闻纸，邓文钊兄弟代垫付外汇订购了大批进口纸张。

1949年底，解放军进兵西南，军队缺乏汽油，急需大量补给。叶剑英从赣州急电要求华南党组织设法从速解决。邓文钊在香港千方百计利用各方面关系，协助党组织抢运大批汽油回广州，及时支援解放大西南的战役。

1950年春广东缺粮，叶剑英要求中央拨外汇进口一批大米，以济人民缺粮之急，并支援部队解放海南岛。邓文钊会同从泰国回来的爱国侨领蚁美厚协助党组织出面与泰国华侨代表商订合同，及时从泰国进口大米7万吨应急。

1950年夏初，邓文钊接受中共华南分局的盛意邀请，准备回广东参加工作。夫人何捷书顾虑丈夫一向在香港生活，一旦回到初解放的广东，恐怕会不习惯，故劝他暂缓回粤。邓文钊出于爱国热情，没有接纳劝告，他对夫人晓之以理，毅然回粤，并于1952年动员夫人回广州定居。

邓文钊返抵广州后，受到中共华南分局和广东省党政领导的热烈欢迎，被任命为广东省商业厅副厅长。到职时，便协助香港华侨工商俱乐部主任黄长水等人组织“港澳工商界东北参观团”北上观光访问。

1950年6月，美国悍然侵略朝鲜，兵临中朝边境。为了保家卫国，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邓文钊按月捐献人民币100万元（旧币，下同），并积极发动工商界捐献。

1951年广东开始进行土地改革运动，邓文钊兼任城乡联络处副主任。邓的祖先原在赤溪农村置有不少田地，因他们一家长